

第6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輯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郑厚安

封面设计：鹿耀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ówài Zhōngguó Jīndàishǐ Yánjiū

第 六 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84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1190·135 定价：1.30元

限国内发行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一、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目的在于介绍国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二、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年）历史的下列稿件：

1. 专论译文；
2. 专著摘译或节译；
3. 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报道或述评；
5. 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6. 其他。

三、本刊并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字，建议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四、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职官、机构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标点符号，数字、年、月、日等标写方法，以本刊所用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五、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当即发函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还。

六、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七、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八、本刊热诚欢迎读者经常提出有关办好刊物的各种建设性意见。

九、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目 录

-
- 1 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
——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中村义
邹念之译
- 38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产
资源的掠夺过程……………君岛和彦
宋绍柏 邹南星译
- 115 华侨与晚清经济近代化……………颜清煌
虞和平译 刘存宽校
- 129 满洲的桥头堡：1897—1902年
英俄抗衡与京奉铁路……………A·L·罗森鲍姆
刘观壁译 范琪校
- 153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时代中英
外交文件提要简介……………黄宇和
区铁译
- 172 满洲事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古屋哲夫
姚仲文译 赵明杰校
- 199 武汉政府的政策……………Г.谢尔盖也夫
林荫成译
- 226 陈独秀的一生及其政治思想……………邳玉汝
吴竞成译 章克生、匡非校
- 251 一篇历史文献——张太雷准备在共产国际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M·A·佩尔西茨
姚宝珠译 邹宁校

- 267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同志谈
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后经过
(1927年5月12日于武汉).....郑厚安译
- 278 鲍罗廷来华前的革命活动.....丹·N·雅各布斯
林海译
- 299 民族因素在中国工人运动中
的作用(1919—1927年).....T·阿卡托娃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资料

- 32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开除蒋中正
党籍发表的声明.....刘佐汉译 郑厚安校
- 325 马日事变资料两则.....郑厚安译

动态

- 327 西德各大学的东方学研究.....大岛偕美
陈相译 邹念之校
- 338 罗斯福、杜鲁门总统的对华
政策观点.....沃尔多·海因里希斯
曾学白译 吕浦校

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

——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

中 村 义

译者按：本文作者中村义，现任东京学艺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清末政治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曾于1981年应邀来我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为日本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丰的学者之一。

本文是作者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一篇论著。文章以招商局的盛衰消长为经，把视野逐步扩大，如对湘淮两系的磨擦，北洋派势力向南方的经济渗透以及由此引起的与南方各省官绅的矛盾，预备立宪运动中地方势力的抬头，立宪派巨头张謇、汤寿潜、熊希龄等对铁路国有化运动的反对等等，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提出了独自的看法，意欲举一斑而窥全豹，可供参考。

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引文有不少注脚颠倒错乱或与原典不尽贴切之处都尽可能核对原典，做了订正或补充。

一 前 言

距今八年前的1952年，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我曾把整整一个暑期的时间用于摘录《愚斋存稿》。转瞬之间，八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这八年的时间内，无论国内或国外方面，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著作。其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被看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而试图加以论证者尤多。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中

所抓的具体问题是形形色色的，如帝国主义在华修建铁路、开掘矿产以及中国的回收利权运动等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当中，盛宣怀总是做为一个重要人物而屡屡被提到，从而《愚斋存稿》一书也就成为第一手资料而从多方面被人引用了。尽管如此，对于盛宣怀本人的具体活动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还没有发现一篇。一般只是给他贴上一个官僚买办资本的标签就算完事。如早期的研究者橘朴，在其所著《支那社会研究》一书中，关于盛宣怀，只说他“不过是官僚资本中最大的一个”；其后较具体的研究著作，如许瀚新在其所著《官僚资本论》中也只把盛宣怀划归为官僚资本，附带稍加分析说：“在新经济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盛宣怀具有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没有的特点。”总之，从前关于盛宣怀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程度上，对于这个人物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都尚未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因此，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末大官僚以及民国以后的四大家族究竟有何不同，这一点还是很不明朗的。幸好去年突然看到美国出版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一书，此书恰如其副标题所示，是盛宣怀的一本评传，也可说是迄今为止第一本集中论述盛宣怀的专著。虽说是一本传记，但其内容却不是烦琐的叙述，而是想从十九世纪末期清朝的官办企业中探寻盛宣怀的历史作用，原作者把这种官办企业称之为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形态。该书的压卷部分是对招商局的分析，对于该局的经营方式、人事演变等等都做了细密的分析和整理，只是在时间上仅仅停留在十九世纪以前，竟然把二十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给脱漏了，而这一段时间恰恰又是盛宣怀政治生涯中意义最关重要的时期。因此，在清末政治史和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段时间，在研究上可说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种情况，本文想在资料容许的范围内，对于导致辛亥革命的许多因素（例如上层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及其与立宪派的矛盾和勾结等等）略作分析，并由此来对盛宣怀的一生进行若干考察。辛亥革命勃发之

时，李鸿章、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受黜，当时做为汉人大官僚而在清政府中枢部门与满清朝廷命运与共的，只有盛宣怀其人。基于这一事实，就更有必要对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进行些研究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想对同治中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这大约四十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一些简单的探索。

二 盛宣怀的登台

有一种说法认为，1872年（同治十一年）是洋务运动第二阶段开始的一年。在第一阶段内，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兴办并发展了许多企业，就其经营方式来看，概系官办；但自第二阶段以后则逐渐转变为官督商办，①李鸿章的下面一段话仿佛象征着这一阶段的特点：“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甚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之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②这就是说：李鸿章等人在当时从筹建军工企业的观点出发，已逐渐把注意力向原料、燃料的供应和运输等方面转移了。为了保证运输畅通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在同年招商局的筹设。李鸿章在筹设招商局的时候，曾遴选稔知海运并熟悉商情的人物委以此任，结果指定浙江海运委员、侯补知府朱其昂负其总责，命道员李振玉、胡光墉两人为辅佐。李鸿章说：“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当即飭派回沪，设局招商。……会集素习商业、殷实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筹商。”③这正是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为了巩固其北洋派的基础而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据《清史稿》记载，负责

① 参看牟安世：《洋务运动》。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③ 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

筹办招商局的朱其昂，系上海人，经营海上帆船运输事业多年，承运浙江——天津间的粮米运输。当冀、晋两省饥荒时，曾出力赈济，为李鸿章所赏识，遂出钱捐得一个道员（原文为道台，误。——译者）的头衔，实际上是个商人，并非科举出身的正规官僚，但其背后却有上海殷实商人（主要是经营帆船航运业的商人）为后盾，这是不难想像的。朱其昂在筹设招商局时曾拟订《招商章程》二十条，主张广招商股，实行官商合办。^①所筹股资计有：上海商股一百一十萬兩，李鴻章個人私股五十萬兩，由直隸軍費撥資附股一百三十五萬兩。^②其中，由直隸軍費拨付的股資所占比重大，這一點恰好說明了招商局顯然已被控制在北洋派的勢力之下了。又說“各幫商人紛紛入股”，^③足證朱其昂、胡光墉等上海坐地商人也加入了股本。當時“僅有輪船伊敦、永清、福興、利運四艘”，^④却得到了“飭撥明年海運漕米二十萬石，由招商輪船運津”^⑤的特殊權利。這主要是想把上海——天津間的海運業交由該局掌握，其最高監管者當然就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本人。鑑於李鴻章任此要職之時是1870年即同治九年，（而招商局的籌設是1872年），由此可見李鴻章籌設商局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鞏固清朝政府，倒不如說是為了加強他自己的北洋派勢力。

從招商局創辦之初盛宣懷就同它發生了聯繫，《清史稿》上有這樣一段記載：“是年冬（同治十一年），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員盛宣懷佐之。”^⑥可見盛宣懷在當時已經是該局的重要成員之一了。盛宣懷進入李鴻章的幕下，恰好是李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那一年即1870年（同治九年）。那一年，李鴻章在海運、外交、兵備等方面都急欲羅致人材，盛在當時還是一名小

① 見前引《海防檔》，第910頁。

② 見《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第99、124頁；但牟安世在其所著《洋務運動》一書中，卻說商股為七十萬兩，直隸官金為一百九十萬八千兩。見牟著第91—92頁。

③ 李鴻章奏，見前引《海防檔》，第926頁。

④ 《徐恩齋自叙年譜》，第18頁。

⑤ 李鴻章奏，見前引《海防檔》，第926頁。

⑥ 《清史稿》交通志，二，輪船。

辈，与乃父盛康共编《经世文续编》，积累了一些学识，虽然应科试名落孙山，但仍未放弃做官的念头，遂提出路矿、电线、航船等许多应时的问题，上书李鸿章做了一些建议，李认为有可取之处，就吸收他当了幕宾。^①换言之，盛宣怀是在李鸿章着手建立北洋派势力的时候最早投靠李的一人。因此，盛宣怀并不是科举出身的正规官僚，而是做为李鸿章的幕僚通过李的提拔走上政治舞台的。盛作为北洋派的一员健将最初接受的带有考验性的任务，就是协办招商局。

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南永街设置机关开始办公以后，不久便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同治十二年，朱其昂以不熟悉外洋情形并黯于航路、船舶业务为理由而自行引退。^②继由广东巨绅唐廷枢（景星）和徐润两人出掌局务。李鸿章之所以起用唐、徐两人，主要是因为盛宣怀在背后荐举：“府君请于文忠，号召熟悉商务之粤绅唐廷枢、徐润等为总董”^③，唐任总办，徐任会办。其后，朱其昂并未完全脱离招商局，仍继续经办漕运事务，以赢实利，“其余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船路、设立各处码头等，均由唐一手经理。”^④关于此次人事变动的意义和原因，因无充分的资料可循，很难做出具体的分析，但据朱其昂在该局创办当时拟定的《酌拟轮船招商章程二十条》来看，他的实际业务能力确属不足，关于轮船的知识尤为欠缺，这恐怕是此次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从这次人事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朱其昂本人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他没有足够的经济背景足以为招商局筹措将来在业务发展上所需的财源。而朱所拟订的二十条章程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轮船招商之后，除每船舵

① 参见《愚斋存稿》。

（此处原注未标明卷页号数。查《愚斋存稿·行述》，则与本文所述稍有不合。《行述》只说“会丁卯秋试未售……”，而与其父盛康共编《经世文续编》等语，则并非此处所载。——译者）

② 参看《刘坤一遗集》，奏疏卷17，《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办法摺》。

③ 《愚斋存稿·行述》。

④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8页。

工水手人等外，仍请酌用水师一二十名，以备不虞。每蹶回沪之暇，由商局督领，随时操演枪炮，年终请调会操，寓兵于商之意也。所有水师工食，由商局给发造报。”^①这就说明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实现该局创设之初所标榜的“发展商务和航运”，不如说军事方面的要求显得更多一些。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才不能唤起商民人等的信赖。第二，从这次人事变动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粤籍上海商人、特别是买办出身的商人走上了政治舞台。买办商人与老牌的传统商人不同，他们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新发展起来的特殊商人。他们不但在资金积累方面比传统商人的办法多；而且通晓洋情，通过跟外国的接触，对于欧美各国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开发等也很关心，较之于旧式的传统商人更具有开明性。

关于唐景星这个人物，以研究中国铁路史著称的肯特（P·H·Kent）曾称赞说：“他是一个进步的、诚实的经营者”。^②唐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842年至1848年间在香港马礼逊公学读书，1851年（咸丰元年）任香港巡理厅翻译官，1856年至1857年任香港大审院正翻译官，1858年任上海海关副秘书长，1859年至1861年升任正秘书兼总翻译。其后，经乃兄茂枝的介绍，任怡和洋行代理人，在长江沿岸一带经商，1863年（同治二年）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再其后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这十年之间，兼充协和机器轮船公司、北清机器轮船公司、华海机器轮船公司董事。通过他的多方活动，这三家公司的业务都有发展，取得了成功。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了上海丝茶两业会馆的董事。^③

① 《海防档》，第913页。

（此处原文标注错误，已微订正。按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为筹设轮船招商局曾前后草拟了两个《章程》。前一个叫《酌拟轮船招商章程》，共二十条，载《海防档》，第911—915页；后一个叫《拟议轮船招商局条规》，共二十八条，载同档第920—923页。原注把两处揉合到一起了。——译者）

② 见肯特著：《中国铁路发展沿革史》，第23页。

③ 参见上海《远东日报》，1878年6月及《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徐润，也是本文要常常提到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事迹将随时加以夹叙，这里为了叙述方便，先将他进入招商局以前的经历简述一下：徐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与唐廷枢同乡。十五岁时随其叔父到上海，入宝顺洋行充买办，给魏布当助手。在上海外国租界附近购置了大片土地。据说这些土地到他在中法战争中失势的时候，价值竟达二百二十三万两之巨。他同自家弟兄在长江流域一带经营茶栈、茶庄，其间曾向俄国大量出口。他在进入招商局之前早已跟唐廷枢有交往，两人常常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唐、徐两人都是买办出身的商人，而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盛传“买办赤手可获千金之利”，^①又说“买办赚的钱要倍于洋行的利润，这种说法虽属可疑，但是买办赚的钱与洋行利润相等，则是肯定的。”^②的确，唐、徐等买办出身的商人确是积累了不少的货币资本。他们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很有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可能性。在当时，大地主、老牌商人和正规官僚们大抵具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并且受着许多陈规旧俗的限制和束缚；而买办商人同他们比较起来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唐、徐等人加入招商局后就使该局的经营方式脱出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马尾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事企业的轨道，它吸收了民间资本，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其直接目的，非为“军事”，而为“求富”。

招商局的成立和发展，使得列强的轮船公司感到了威胁，在招商局成立之前，以英国怡和、美国旗昌等公司为首的外国轮船，早已将其活动范围扩张到中国海域。它们在长江流域及中国沿海一带展开了频繁的活动。^③招商局成立后，它们就千方百计

①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第198页。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77页。

③ 盛宣怀在奏摺中曾谈到当时的情况，他说：“船局始于同治十一年。其时洋商旗昌、怡和、太古各公司轮船久已在长江及闽粤津沪海面载货搭客，往来如织。”见盛宣怀：《遵查轮、电两局款目，酌定报效银数，并陈办理艰难情形摺》，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载《愚斋存稿》第3卷。

地要把该局挤垮：“太古、旗昌两洋行合力以倾我招商局，各项水脚减半，甚且减三分之二。该洋行意在陷人，不遑自顾。……然招商局既与其争衡，即不能不随之跌价；既随之跌价，即不能不共其亏折。以商本而论，似未足以抗洋行。”^① 买办本是列强侵入中国的一个私生子，不料这个私生子所经营的企业眼睁睁地又要被他那生身之母亲手扼杀了。到1876年（光绪二年），招商局表面上虽似繁荣，实际上“华商股本已折阅殆尽”，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② 这实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在这艰难的岁月当中，唐、徐两人惨淡经营，展开了多彩的活动。光绪二年夏，他们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一年之后获利甚钜，赖以支撑招商局突破了难关。特别是徐润，他不但在危机中拼力支撑；即在平时，为了招商局的发展，他也是多方奔走，不遗余力的。这在收买美国旗昌轮船的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收买旗昌轮船的活动，是从瑞生洋行的一个洋人把旗昌洋行愿以二百五十——二百六十万两的代价将其所有轮船全盘出让、但须在数日内尽快做出决定的消息透露给徐润以后立即开始的。当时唐廷枢和盛宣怀两人都不在上海，一个去福州，一个往湖北，那时又没有电讯设施，无法商量，徐润立即与其知友严芝楣竟夜计议，决定派人去福州促唐返沪，他本人亲自去湖北武穴访晤盛宣怀。盛表示赞成，遂相偕返沪，道出南京，与唐廷枢不期而遇，遂邀集梅方伯、桂芑亭、黄幼农等人共同筹议，决定借用官金，因与沈葆楨商谈，沈最初表示无能为力；其间盛宣怀各处筹措，已得款约近一百万两，乃于次日与梅方伯会晤，得知某处尚有二十万金可以拨用，盛即再度往访沈葆楨请求援助，沈始应允。遂于光绪三年正月召开合同会议，使收买旗昌一事得以实现。^③ 在这一段活动中，徐润虽说“此皆盛杏翁之力也”，然而盛宣怀为筹集官金固然出力不少，而徐润则连自己的家资也大

①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见《海防档》，第948页。

② 《遵查轮、电两局款目，酌定报效银数，并陈办理艰难情形摺》，见《愚斋存稿》，第3卷。

③ 参看《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9页。

都倾用出来了。这次筹集的银两中计有：“各商集银二十万两，沈葆楨五十万两，浙江二十万两，江西二十万两，湖北十万两。”^①这是招商局成立以来办成的第一件大事，收买旗昌的圆满成功，大大巩固了盛、徐两人在招商局内的地位。特别是对盛宣怀来说，通过这件事不仅使他在北洋系幕僚中的身价得到显著提高，而且还使他把招商局看成了自己终身的政治资本。收买旗昌成功以后，招商局的事业确实得到飞跃发展：船只增多了，航线延长了，能够远航到日本、吕宋及新加坡等地，并积极向外洋发展。同时，由于徐、唐等人的多方设法，使招商局在民间商人中间的信誉也显著提高，募股较易，因而在资金方面也有了迅速的扩大。创办当时的资本仅为五十万两，到1880年已增至一百万两，1882年又骤增至二百万两；且自1880年以后，借取官方的银两也开始逐渐减少。^②这样航路的不断扩大和基础的日趋巩固，使得外国轮船

① 《清德宗实录》，卷44，光绪二年十二月辛卯条。（此处原文为“各商集银二十万两，沈葆楨五十万两……”，但《实录》记载则为：“各商筹银一百二十万两，其不敷之数由沈葆楨及该省藩司筹银五十万两。”——译者）

② 参见《字林周报》1881年10月4日。又，《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一书中载有“招商局成立以来历年招募股额及借用官金统计表”，摘录如下。

招商局成立以来逐年招募股额及借用官金统计表

年 份	招股额（圆）	年份	借用官金额
1873~74	476,000	1878	1,928,000
1874~75	602,000	1879	1,928,000
1875~76	685,100	1880	1,800,180
1876~77	730,000	1881	1,518,000
1877~78	751,000	1882	1,217,000
1878~79	800,600	1883	964,291
1879~80	830,300	1884	832,274
1880~81	1,000,000		
1881~82	1,000,000		
1882~83	2,000,000		
1887	2,000,000		
1892	2,000,000		
1897	4,000,000		
1902	4,000,000		
1907	4,000,000		

公司越来越感到不安。1884年英国驻华领事在致其本国政府的《商务报告》中曾说：“我们在贸易上的唯一劲敌，即是招商局所属轮船。”^①于是，外国轮船公司再一次降低运价，企图压垮招商局，“乃美国之旗昌归并已成，不期英国之太古忌嫉更甚。……故意减低水脚，上海至汉口每百觔跌至水脚一钱，上海至汕头每百觔六分。”^②如此多方阻难，压迫招商局，欲使其事业不得正常发展。这时的招商局真是忧患重重，除在外部受到洋商的挑战外，在内部也遭到多方的指责。如1878年（光绪四年）^③御史董佛翰上奏说：“轮船商局关系紧要。……上年归并旗昌洋行各轮船后，成本愈重。该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其致亏之由，一因置船过多，揽载货物之资不敷经费；一因用人太滥，耗费日增，请飭实力整顿，”云云，^④嗣于1880年（光绪六年），著名的湖南乡绅王先谦又上书指责招商局的弊端。其要旨略为：招商局自成立以来，初以朱其昂之无谋，嗣因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经营不善，以致连续亏损；尤以盛宣怀在收买旗昌之际竟私吞巨款达百万两，情节殊为严重，云云。^⑤这一指责上达后，朝廷即命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查办，刘命江海关道刘端芬（应为刘瑞芬。——译者）与湖南制造局（应为江南制造局。——译者）直隶补用道李兴锐两人进行具体调查。刘坤一综合调查结果并附加他个人的意见，分别于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及同年三月初三日先后两次复奏。刘在复奏中对招商局首脑成员应负的责任一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唐廷枢素习外国语言文字，为招商局不可缺少之人，应予宽免，继续留用。”独对盛宣怀弹劾甚严，两

① 见《英国驻华领事的商务报告》，载《蓝皮书》，1884年。

② 参见《谨陈明招商局创设始末及公款积多酌拟变通办理并请推广办法节法节略》，载《海防档》，第979—982页。

③ 据《海防档》，载，御史董佛翰上摺在1877年即光绪三年。原摺见《海防档》，第973—975页。——译者

④ 《德宗实录》，第58卷，光绪三年九月庚午条；又，《清史稿》，交通志二，轮船。

⑤ 王先谦奏，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37—40页。